

如何培养真正的“人”是中国教育首要问题

□钱颖一

在中文里，“人才”是一个词，并不是“人与才”。事实上，我们通常都把“人才”简单地落脚为“才”。古人讲的“不拘一格降人才”，讲的是“才”。我们今天讲的大学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讲的也是“才”。像清华这样的研究型大学还特别强调“拔尖创新人才”，讲的还是“才”。所谓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讲的仍然是“才”。

“育人”重于“育才”

现在有必要把“人”与“才”拆开来看。“才”的英文是 talent，而“人”的英文是 human being。我们使用的“人才”一词，确切地说，是指“人中之才”。而“人中之才”不同于“有才之人”。“人中之才”强调的是“才”，关注的是“三力”：创造力、分析力、领导力。而“有才之人”强调的是“人”，人有“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度量“才”的词是“成绩”、“成功”、“成就”，而形容“人”的词则是“自由”、“快乐”、“幸福”。

我曾讲过很多有关“育才”和“成才”的道理和方法。然而，今年我们在总结学院建院30年的三条重要教育理念时，第一条是“育人”重于“育才”。这是从教育者的角度说的。从被教育者角度看，则是“成人”重于“成才”。这里都是讲“人”重于“才”。

“人”重于“才”确实是我们学院的传统。我们学院首任院长朱镕基在2011年4月回学院时，对经管学院的学生们说：“做人”比“做官”、“做企业家”更重要，就是讲“人”比“才”更重要。在2001年6月在清华大学综合体育馆，朱院长在“离任演讲”中说，“为人比为学还要重要”。1992年清华电机系建系60年，朱镕基作为系友致信，引述他上学时的系主任章名涛的话，强调学生要先学“为人”，再学“为学”。三次讲话，都是讲“人”重于“才”。

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尽人皆知。但是它的出处和原用意，却非每一个人都清楚了。它是出自一篇整

整一百年前教清华学子“做人”的演讲。1914年，清华建校刚三年。梁启超到清华演讲，题目是“君子”，对应的英文是 gentlemen。梁启超以“君子”寄语清华学子，强调的是做人：清华学子，首先要做君子，之后才是做才子。在演讲中，他引用了《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说明的是做君子的条件。他还引用王阳明的话，“治山中贼易，治心中贼难”，说明“做人”比“做事”更难。正是由于此篇演讲，“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才成为了清华的校训。虽然我们把这个校训常挂在嘴边，却容易忽略这是一篇教导清华学子“做人”、“做君子”的文章。

中华文化的传统，中国教育的传统，从来都是重视“做人”的传统。“四书”中《大学》开头便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几乎每一个中国教育者都常引述的一句话，讲的是大学的目的是人，是人的道德，是人的善。中国文化中的做人是非宗教的，这是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

但是这个重“人”的传统后来发生了变化，使得重“才”逐渐压倒重“人”。直接原因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方了。落后就挨打，因为西方有枪炮，西方有科学技术。所以我们要科学救国、技术救国、实业救国。因此教育就转向科学知识、技术知识、专业知识的传授，转向对“才”的培养。不仅在中国，在所有落后国家实现追赶中，都是一样的。

不过这种由“人”向“才”的转向在中国近年来有些走向极端。过去35年，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和开放，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经济增长在一些人眼里似乎变成了唯一的价值和目标。即使当下不少人讨论转变发展方式，创新驱动，也仍然是把经济发展作为目的。在这种思维中，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人才就成为加速经济发展的动力。“育才”也随之变成了教育的目的。

在现代经济学中，人有两个作用：一是作为劳动力，是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品，是生产要素。劳动力中就包括了“才”的贡献，它使得人作为投入品更具生产力。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经济活动的工具。但是，人在现代经济学中又是消费者，是享受消费品的主体，其幸福程度用人的“效用函数”来度量。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经济活动的目的。所以在现代经济学中，人不仅是工具，也是目的。在康德看来，人只能是目的，不能是工具。康德的哲学使得“人是目的”这一价值更加清晰和突显。无论如何，只要人是目的，不仅是工具，教育的目的就应该是“育人”。

何为“人的教育”

在我看来，作为目的的“人”包括“人文”、“人格”、“人生”三个方面，因而人的教育应该是人文精神的教育、人格养成的教育和人生发展的教育。

人文是相对于科学而言的。科学包括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经济和管理都是社会科学，而人文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等。我们说人文科学，但不说人文科学，因为人文不是科学，而是价值、是判断、是解读。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来都是科学进步与人文进步并举。如果说科学是为了做事，那么人文是为了做人，做有品位的人。科学告诉你什么是真理，人文告诉你说话的价值。人文在清华有着深厚的底蕴和传统。在清华大礼堂中悬挂着一块匾，是清华1926级毕业生送给母校的礼物，上书“人文日新”四个字，就是一例证。

曾经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任教的龙应台女士是这样来解读人文的：文学使你看见原来看不见的东西，可以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从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星，从而有了走出思想迷宫的可能；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所以，文学让你看见，哲学让你定位，历史让你连接，这些都是人文的价值。

以人文为基础的人格是做人的准则。人格养成是人的教育的基础，也是清华的传统。100年前梁启超谆谆教导清华学子要以君子为人格之标准。老清华校长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推崇“整个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的教育。我们学院今年提出学院核心价值：对己正直诚实、对事/敬业尽责、对人尊重宽容，第一条就是讲人格。“完整人格”是对人格的较高要求，正直诚实是对人格的基本要求，而对人格的起码要求就是人格底线。说

话有底线，就是说话讲真话；做事有底线，就是做事有原则；做人有底线，就是做人有良知。人格的底线就是文明人的底线。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批评我们的一些精英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批评的不是一般的利己主义者，而是那些学过很多知识，善于利用制度的缺陷和传统的弊端，同时又没有人格底线的利己主义者。“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一些智商高(甚至也情商高)但人格低的“成功”人士，他们往往是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精英大学中聚集了很多有才的人，如果有人格，他们的正面作用会很大；但是如果没有人格，他们的负面影响也会不小。这在近期的“反腐”中可见一斑。

人生既有对人生发展的梦想，更有对人生意义的探索。记住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未经反省的人生不值得过。”(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在你进入大学的今天，就应是你反省人生的开始，思考人生的起步。反省人生是发现自己，认识世界的过程。特别是我们学院本科教育改革的两个支柱之一是“个性发展”，就更需要同学们把自己的个性发展放在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之中。

哈佛商学院以研究创新而著名的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教授在2010年为哈佛MBA毕业生作演讲。两年后，基于该演讲的书《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How Will You Measure Your Life)成为畅销书。克里斯坦森运用经济学和管

理学的分析方法探讨这样的问题：如何确定你在事业中获得幸福？如何确定你在家庭和朋友的系中获得幸福？如何确定你能一生保持正直，从而远离犯罪？他讲的是反省人生的感悟，是人格基础上的人生，是超越“成才”的道理，很有启发。

实现“人的现代化”

今天我讲的是，“人”重于“才”；今天我关注的是：人文、人格、人生；今天我阐述的是：人文精神、人格养成、人生发展；今天我向你提出的要求是：理解人文价值，坚守人格底线，反省人生意义。

我从不怀疑中国会出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才，这是概率为一的事件，不确定的只是时间的早晚和人数的多少。但是，中国教育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如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如何培养真正的“人”的问题。爱因斯坦早就说过：“学校的目标应该始终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The school should always have as its aim that the young man leave it as a harmonious personality, not as a specialist.)戴安娜王妃也多次对她的长子威廉说，“你在成为王子之前，先要成为一个人”(you must be a man before you can be a prince)。如果我们把对培养不好真正的“人”的忧虑放在对培养不出拔尖创新“人才”的担忧之上，那么中国的教育就会有新面貌。

说到底，培养真正的“人”是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如果说“四个现代化”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那么“人的现代化”就应该是最高层面——价值层面的现代化。这就是为什么“人”重于“才”。

(作者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本文节选自作者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014级本科生开学典礼上的致辞，标题为编者所加)

□策论

上海孕育科技创新中心的历史机遇与实力基础

□杜德斌



图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同步辐射光源(Shanghai Synchrotron Radiation Facility)，是中国重大科学工程，坐落于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上海光源为中国科学界和工业界提供了一个与世界同步的大科学实验平台，对推动中国多学科领域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产生重大作用。

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支撑，成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进步的强大引领，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在这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作为我国经济龙头的上海，应肩负起使命，以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开启全球城市发展新征程，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贡献。

正在崛起的中国必须拥有世界级科技创新中心

我国正处于实现和平崛起战略目标

的前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但技术创新能力不强、缺乏核心技术仍是我国的短板。由于创新资源的高度流动性和科研活动的空间集聚性，谁拥有21世纪世界级的科技创新要素，进而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战略主动权。因此，积极谋划建设全球创新中心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举措。英国于2010年启动实施了“英国科技城”的国家战略，试图将东伦敦地区打造为世界一流的国际技术中心；美国试图借助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先发优势引导产业回流以重构全球分工体系，并于2012年制定了打造“东部硅谷”的宏伟

蓝图，计划在曼哈顿以东创建一个与加州硅谷并驾齐驱的应用科学园，力图成为“全球科技创新领袖”。英美两国对于科技创新中心的布局都值得我国关注。经济合作组织(OECD)2012年报告曾经指出，在中美科技竞争中，我国有两大短板：一是缺乏像硅谷那样的区域创新龙头；二是缺乏世界一流大学。可以说，通过集聚海内外高端创新资源，培育我国自己的科技创新中心和区域创新龙头，以引领科技发展、助推产业转型，是我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招。

科技全球化赋予我国孕育全球科技中心宝贵的历史机遇

任何科技中心的兴起都是时间和空间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迄今人类历史上共发生过5个波次的创新资源跨国大转移，每次转移都会在新的区位优势造就新的科技中心，并引起国际间的大国消长和霸权更迭。例如，从18世纪晚期开始，法国迅猛吸收英国先进科技成果，极大推动了自身重工业发展，使其崛起为“日不落帝国”之后的第二个全球性帝国。

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创新浪潮方兴未艾，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急剧调整和变化，全球创新空间和分工体系处于一次“大洗牌”的前夜。当前，亚洲正处于新一轮科技浪潮的活化地带，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枢纽地位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巩固，在世界经济空间体系中正从边缘向核心区域过渡，包括创新资源在内的全球高级要素正呈现出系统性东移的趋势。在此背景下，亚洲必将诞生一批世界级的科技创新中心，甚至1-2个足以与伦敦、纽约相抗衡的全球城市，

从而重构世界政治经济和科技版图。

作为亚洲第一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具有无与伦比的战略优势，这不仅在于人口、面积和位居亚洲核心的位置，更重要的是我国有着海量的科技人力资源、极富活力的经济体系和不断壮大的市场规模。我国每年的经济增量占全球经济增量的30%，规模经济所带来的竞争优势足以压倒世界市场中任何低抗性力量。正是源于这些优势，近10年来跨国公司纷纷以我国为核心构建其区域乃至全球价值链。在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中，只有我国更具备孕育像硅谷那样的科技创新中心所需的资源丰度和市场深度。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亚洲新一批的科技创新中心必然主要产生在我国。

上海初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实力基础

上海作为我国最大的综合性经济中心城市，产业和技术实力雄厚，在全国最具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潜力。建设上海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既是国家战略所需，亦是上海自身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内在要求。

市场是决定资源配置的最终力量。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的跨国公司，其全球经营网络和空间转移轨迹往往昭示了世界科技中心的兴衰趋势。新世纪以来，跨国公司纷纷来华设立研发机构和开展创新活动，我国日益成为跨国公司全球研发布局的热点地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机构已超过1500家，雇用了超过15万名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人员，上海则成为跨国公司研发机构进入我国的桥头堡和集聚地。目前，上海已成为跨

国公司全球研发网络的关键节点和重要枢纽。截至2013年底，在沪外资研发中心已达366家，其中世界500强企业研发机构120多家，分别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和三分之一，已有70多家跨国公司在沪设立全球性和区域性研发中心。一些跨国公司在沪研发机构的业务活动性质也不断由针对中国市场的适应性、专门性研发转变为母公司全球市场提供技术服务的创新性研发，技术服务范围已从“服务中国”发展到“服务亚太”或“服务全球”、“在中国(上海)为世界”的反向创新模式已成为重要趋势。例如，通用电气、霍尼韦尔、陶氏化学等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在上海的研发中心，雇用的技术人员均达数千人，在业务功能和规模等级上已成为与其北美和欧洲研发中心并驾齐驱的第三极。

用其他指标衡量，上海相对世界其他主要城市的科技优势也在日益巩固和强化。上海已建成上海光源、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生物样本库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科研基础设施。2013年，全市有效发明专利达到48370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20.32件。目前，在沪两院院士达165人，中央“千人计划”专家626人。国家科技部、统计局发布的《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报告》显示，上海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已连续5年位列全国第一。日本“森纪念财团”和韩国首尔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13年全球城市综合竞争力指数》(Global Power City Index 2013, GPCI 2013)报告显示，上海的综合竞争力位列全球第12位(北京第14位)，其中研究开发竞争力位列全球第16位(北京第22位)。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软科学研究基地美国创新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五点建议：

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上海既要有长远谋划，也要正视现实问题，近期宜从以下5个方面着手推进。

第一，成立以市主要领导为组长的科技发展领导小组，为科技发展制定战略、规划和政策；制定科技应用政策，用科技促进城市社会经济的高效发展，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统筹科技发展。

第二，明确将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目标纳入“十三五”规划和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做好顶层设计，在巩固金融、经济、贸易、航运等传统功能的基础上，强化科技创新功能，使其成为上海全球城市建设的五大核心功能之一，抓紧制定上海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专项行动计划或中长期战略规划。

第三，在科学预测未来30年上海城市发展需求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技术预见、技术路线图等方法，凝练科技创新重点领域及核心技术攻关清单，布局一批能体现21世纪世界城市发展最新理念的前沿技术。

第四，通过高等教育改革，调整高等教育结构，着力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加大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引进海外一流大学来沪办学，提升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同时，顺应全球人才流动趋势，探索多种人才政策试点，最大限度集聚全球顶级人才。

第五，选择一批代表上海产业发展方向和具有较好潜力的国企、民企，综合运用财政、税收等多种扶持方式，培育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具有核心竞争力和较强国际经营能力的本土创新型跨国公司龙头企业。